

语言多维研究新视角

詹伯慧 邵敬敏 主编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YUYAN DUOWEI

YANJIU XINSHIJIAO

非外借

语言多维研究新视角

詹伯慧 邵敬敏 主编
赵春利 副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立于1897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多维研究新视角 / 詹伯慧, 邵敬敏主编.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5587-8

I. ①语… II. ①詹… ②邵… III. ①汉语—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7068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语言多维研究新视角

詹伯慧 邵敬敏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587-8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1 1/4

定价: 48.00 元

前言

2006年，恰逢暨南大学建校100周年，为了检阅我校语言学科的科研成果，我们曾经编辑出版了《南珠集·语言学卷》，副标题是“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论文精选”，收录了同仁的论文47篇。2016年，为了庆祝暨南大学成立110周年，也为了回顾这十年我们文学院语言学科所走过的历程，我们计划再编撰一个续集，因为华文学院的应用语言学科已经突飞猛进，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这次就不再收录他们的文章了，书名也改为《语言多维研究新视角》，共集得论文25篇。抚摸着这些稿件，我们未免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因为我们深深知道这十年不是平平常常的十年，是拼搏的十年，收获的十年。

我们暨南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科主要由三个团队构成。

第一方阵是方言学。

暨南大学的汉语方言研究一直是暨大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强项。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成立于1994年。由詹伯慧创办，前身为1984年成立的汉语方言研究室。中心成立之时，正值暨南大学第一批攻读汉语方言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毕业之时。当年全国首批获授博士学位的汉语方言博士生共五位，除中国社科院李荣培养的周磊外，其余四位就是暨大詹伯慧培养的伍巍、张晓山、邵宜和邵慧君。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的发展几经波折，期间曾经中断，2007年恢复运作。2008年5月，中心获批为第五批“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先由伍巍出任中心主任，后由甘于恩继任主任迄今，詹伯慧一直担任名誉主任。十多年来，中心以“夯实基础、谋求发展”为基本指导方针，以“立足广东，引领全国，走向国际”为目标，围绕“项目意识”“平台意识”“联合意识”“品牌意识”“应用意识”五个意识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积极开展各项科研活动。

中心拥有一支长期活跃在汉语方言学界的学术团队,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经常承担汉语方言的重大科研项目,以出色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 and 省级的许多奖项,深受语言学界瞩目。教育部推荐的全国高校通用教材《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也是詹伯慧主编的,2011年,詹伯慧更获评为广东省首批16位优秀社会科学家之一。近几年,中心在组织力量申报国家重大项目与重点项目方面获得突破性的发展。一共承担了30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其中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就有三项:詹伯慧的“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与数字化建设”(2013)、陈晓锦的“海外华人社区汉语方言与文化研究”(2014)和范俊军的“中国濒危语言数字博物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4)。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有四项:范俊军的“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的理论体系、实践规程和技术准则研究”(2012)、甘于恩的“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研究”(2013)、范俊军的“中国语言生态监测理论及信息平台建设研究——以岭南地区为中心”(2013)、陈晓锦的“美国华人社区汉语方言与文化研究”(2014)。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有三项:范俊军的“五岭汉语方言和瑶语生态评估及双语接触研究”(2006)、陈晓锦的“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2007)、刘新中的“粤方言语音特征的实验语音学研究”(2014)。国家社科青年项目有一项:侯兴泉的“汉语方言分区语音特征的层级和主次研究”(2012)。已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均为优秀,项目成果在语言学界和相关社会领域得到了有效应用。

近年中心出版了中心成员的研究成果《南方语言学丛书》八部,另有个个人专著和主编著作(含教材)20部陆续问世。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在《中国语文》《方言》等权威期刊上有18篇,例如侯兴泉《论粤语和平话的从邪不分及其类型》(2012),甘于恩、赵越《粤方言的完成体标记“休”及相关形式》(2013),范俊军《仙岛语的语言系属和地位问题》(2015)等。

中心与国内外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术交流,举办多种学术研讨会,主要有四大系列:“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粤方言国际研讨会”“中国濒危语言有声资源采录和立档技术高级讲习班”以及“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比较有影响的,例如“庆祝詹伯慧教授80华诞从教58周年暨汉语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第十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暨海外汉语方言专题讨论会”(2012)、“全

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2013)、“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11届全国研讨会”(2015)等。还连续举办“中国濒危语言有声资源采录和立档技术高级讲习班”(已举办3期)、“岭南汉语方言研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地理语言学培训班”(已举办6届)、“南方语言学论坛”(已举办50多期)。

中心还力求科研创新和体制改革,在岭南地区各高校,如韶关学院、湛江师院、嘉应学院、深圳大学、华侨大学、汕头大学、泉州师范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等处设立了27个科研工作站。创办《南方语言学》半年刊,已出版10期,成为辐射全国、影响海外汉学界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

第二方阵是语法学。

语法学科也是我们暨南大学语言学科的强项,近年来语法研究出现好的势头,主要是研究思路比较清晰,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获得双丰收:

第一,尽可能地把语法学与方言学结合起来。因此21世纪初邵敬敏申报了国家社科项目“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主持召开了“第三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并且出版论文选《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新拓展》,项目结题后还出版了专著《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这就为整合语法与方言两大学科提供了新的契机。

第二,发扬并拓展暨大独特的研究优势。在“语义语法研究”以及“语法学史研究”两方面有所突破,几年来出版的学术专著有20种,主要有:邵敬敏《汉语语义语法论集》《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增订本)、《汉语语法动态研究》《汉语追梦录》等,以及赵春利《现代汉语形名组合研究》与周娟《现代汉语动量词与动词组合研究》,并且多项获奖。

第三,紧紧抓住语言的应用研究。教材方面主要是修订并出版了《现代汉语通论》,并编撰新教材《现代汉语通论简明本》《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等。即将出版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对外汉语教学语感培养研究》,另外,借着获批“虚词研究”国家课题的东风,正在着手编撰一部新颖的研究型的《汉语虚词框架词典》,争取2019年出版。

此外,该团队还编撰了十多本论文集,例如《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拓展》(三)(四)(五)(六)(七)、《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30周年纪念文集》等。

在学术论文方面,该团队也喜获丰收,发表有关论文200篇左右,其

中在《中国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了19篇,核心期刊近百篇。例如邵敬敏的《语义特征的界定与提取方法》(周芍合作)、《“好”的话语功能分析》(朱晓亚合作)、《“V一把”中V的泛化与“一把”的词汇化》《汉语框式结构说略》;赵春利的《语气、情态与句子功能类型》(石定栩合作)、《句末助词“吧”的分布验证与语义提取》(孙丽合作)等。

语法团队人数虽不多,但全都承担了国家社科项目,既有重大项目,如邵敬敏的“境外汉语语法学史及数据库建设”(2016);也有一般项目,如邵敬敏的“汉语虚词词典编撰的方法论创新及其实践”(2012)、赵春利的“基于语义地图的句末助词多功能研究”(2013)、周娟的“汉语话语视角与视角标记研究”(2016)以及刚刚公示的赵春利的“汉语情态副词的语义提取与分类验证研究”(2017)。同时还承担了多项省部级重点、规划和青年项目,例如暨南大学语法团队与南京大学合作承担国家语委重点项目“两岸(港澳台和大陆)语文状况和发展趋向比较研究”、邵敬敏的广东省重点项目“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2007)、赵春利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语言类型学的形名组合研究”(2012)、周娟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汉语动量结构状补句位选择机制及跨语言比较”(2013)等。

辛勤的劳动变为丰硕的成果,语法团队多次获得有关奖项。例如:邵敬敏、郑娟曼《“好”的话语功能及其虚化轨迹》2007年获第二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邵敬敏《汉语语义语法论集》2009年获广东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邵敬敏“‘连A也/都B’框式结构的争议及其框式化进程”2013年获国家教育部第六届优秀文科论文三等奖;邵敬敏2013年获暨南大学校长特别奖“杰出教学贡献奖”(全校唯一);邵敬敏2015年《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获广东省第七届哲学社科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邵敬敏领衔《现代汉语》2007年获广东省精品课程称号;邵敬敏领衔《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2009年获暨南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称号;赵春利《现代汉语形名组合研究》2015年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2015年入选“暨南杰出青年学者支持计划”第一层次培养对象。此外,邵敬敏主编《现代汉语通论》入选“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6年)以及“教育部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12年),并荣获第六届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10年政府奖)。

语法团队还有一大特色，就是主持或主办四大重要学术会议系列：

一是“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常设秘书组，邵敬敏为总召集人，赵春利与周娟任秘书组组长，主持筹备工作，2003年在暨南大学举办第二届，以后连续举办：2005年在浙江师范大学，2007年在青海民族学院，2009年在香港理工大学，2011年在台湾高雄义守大学，2013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15年在浙江大学，2017年在韩国延世大学召开，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获得一致好评。

二是“汉语语法南粤论坛”：由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主办，会长邵敬敏主持工作。本论坛以“现代汉语语法、方言语法、历史语法及其交叉研究”为主题，第一届于2006年在韶关学院，第二届于2008年在肇庆学院，第三届于2010年在澳门大学，第四届于2012年在嘉应学院，第五届于201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第六届于2016年底在深圳大学举行。这一论坛因其参会学者层次比较高，中心议题为现代汉语语法与方言语法、历史语法相结合，因此已经成为高层次的学术盛会。

三是“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年会”：2009年在韩山师院，2011年在湛江师院，2013年在中山大学，2015年在华南理工大学隆重举行。

四是“现代汉语教学研讨会”：2010年在暨南大学、2013年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江苏昆山），2014年在暨南大学，一共举办了三次。

语法团队的目标是立足广东，面向全国，走向国际。数量不求多，质量要求高，努力建设一支精干有战斗力的群体。

第三方阵是汉语史研究。

汉语史研究在暨南大学也是有优秀传统的。该团队既有从事古汉语研究的，也有从事近代汉语研究的，还有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可谓三剑合璧。

一是古代汉语研究。王彦坤教授著作颇丰，尤其在字典词典编纂以及教材编写方面独占鳌头，前后出版了《现代汉语三音词词典》《前四史生僻词语考释》《历代避讳字汇典》《文史文献检索教程》等，获得学界好评。他还获得一项国家社科后期资助《南宋罗泌〈路史〉校注》（2014）。熊焰教授的专著有《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研究》，近年来对“五四”前后文言文即现代文言文的语言特色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专题系列论文，填补了“五四”前后文言文语言研究的学术空白。

二是近代汉语研究。曾昭聪主持国家社科项目“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

录俗语词研究”(2009)、“明清民国方言辞书及其所录方言词研究”(2015),还承担了全国高校古委会“《清平山堂话本》校注”(2007)、“《土风录》校注”(2011)、“《谈征》校注”(2015)以及《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2015)等项目。他笔耕不辍,勤奋好学,发表论文上百篇,代表作有《古汉语异形词与词语释义》(2013)等。近年出版的著作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研究史略》《汉语词汇训诂专题研究导论》《清平山堂话本校注》。其中《清平山堂话本校注》获中华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他还于2007年被评为南粤优秀教师。

三是民族语言研究。班昭教授主攻壮语,主要论著有《论汉语中的台语底层》《壮语描写词汇学》《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等。

汉语史研究的品种比较齐全,成果也比较丰富,形成了互补互促的格局。

暨南大学文学院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教师并不多,全部加起来不到20位,但是这些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大家精诚团结,在方言、语法和汉语史等方方面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本论文精选只是反映了同仁的部分成果。我们回顾历史,目的是展望未来。当前,暨南大学正在建设高水平大学,其中学科建设是关键。我们语言学科完全有信心,在今后十年里,决不故步自封,一定要更上一层楼。汉语要走向世界,汉语研究要登上国际舞台,这就需要我们排除一切干扰,踏踏实实地进行研究。这本小书,既是汇报,也是鞭策;既是回顾,也是前瞻。我们相信,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我们更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暨南大学的语言学科是大有希望的。

詹伯慧 邵敬敏

2017年6月16日

目 录

一、汉语方言探索·····	1
关于闽方言研究的几点思考·····	3
关于方言词的用字问题	
——以粤方言为例·····	19
析“築”·····	32
南方方言性别标记虚化现象研究·····	42
广州地区的客家方言·····	61
泰国曼谷半山客话上声读如去声析·····	71
广东粤方言完成体标记的共时与历时研究·····	76
河南滑县方言的五类处置式·····	94
海南东方市四更镇付马话同音字汇·····	107
几个汉语方言音系中记录为8号不圆唇元音[ɯ]的音·····	135
株洲话单纯名词轻重格的影响因素·····	147
广东封开南丰话的三种正反问句·····	157
论粤语和平话的从邪不分及其类型·····	168
二、汉语语法研究·····	185
汉语框式结构说略·····	187

《汉语虚词框架词典》编撰的创新思路	204
句末助词“吧”的分布验证与语义提取	218
关于语义语法的逻辑界定	237
论话语视角标记“X说来”	256
三、古代汉语考释	271
《史记》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考释	273
读《诗》四法	278
古汉语异形词与词语释义	286
明代歌曲释词三例	294
唐五代四史词语考释与《汉语大词典》修订	299
四、民族语言探究	307
甘桑石刻文初步研究	309
壮语四音格及其类型学意义	321

—、



汉语方言探索

关于闽方言研究的几点思考

詹伯慧

一、闽方言研究的现状

闽方言在汉语方言中处于相当突出的地位。就使用人口而言,据张振兴先生近年来的统计,闽、台、粤、琼等省以及浙、桂、苏、赣等省(自治区)的少数地区就有 5462 多万人,加上海外华人及港澳同胞中以闽方言为主要交际工具的也有 1000 万人,这样,世界上用闽方言作为日常交际工具的就大约有 6500 万人^①。这个数字当然比不上作为民族共同语基础的北方方言(官话方言),但以其在海内外的影响而言,闽方言的地位和作用绝不亚于其他汉语方言。最近有人就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势力进行排队,认为最强势的方言在北方为北方方言,在南方为粤方言^②。除了南北两大强势方言之外,我想闽方言和吴方言无疑也该属于强势方言之列。吴方言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不亚于闽方言,但在中国大陆以外,闽方言的影响却大大超过吴方言。

闽方言的地位和影响使闽方言的研究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远的如 18 世纪一些“十五音”系统的闽方音韵著作及 19 世纪以来一些传教士编纂的闽方言字典暂且不说,单就近半个世纪海内外关于闽方言的研究来说,其人数之众多、成果之丰硕都居汉语各大方言的前列。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来已刊闽方言研究成果的篇(册)数字,大概超过 500 项。我们在《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一书的附录“现代汉语方言研究参考资料选目”

① 参看张振兴:《闽语的分布和人口》,《方言》,1989 年第 1 期。

② 参看易丰:《汉语方言势力探微》,《语文建设通讯》,1992 年第 37 期。

中遴选了闽方言的著述 371 项,而同时选入的粤方言著述是 206 项。这还只是选到 1987 年为止,此次闽方言研讨会上,林伦伦先生在宣读他的《广东闽方言研究述评》一文中所附“广东闽方言研究文献要目”(截至 1992 年),就列出广东一省的闽方言著述 181 项,可见粤方言尽管被认为是比闽方言更具强势的方言,但实际上闽方言的研究成果却大大超过粤方言。几十年来闽方言研究的覆盖面已遍及闽、台、粤、琼各省不同类型的闽语,就研究内容而言,既有共时的描写研究,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也有历时的比较研究,涉及音韵、训诂等许多课题;而闽方言的形成问题、分区问题,以及一些突出的方言现象,如文白异读、连读音变、训读现象、本字探索等,或多或少也都陆续有所发现、有所讨论。此外,在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机构的日益增多、学术活动的持续活跃方面,闽方言也是相当令人瞩目的。像这样两年一度的闽方言学者国际盛会,现在是第三届了,今后还会继续举办下去,通过这种定期举行的学术研讨会,检阅闽方言研究的成果,总结闽方言研究的经验,交流闽方言研究的心得,作用无疑是非常显著的。

尽管闽方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的成果,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硕果累累”,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两个不平衡:

一是研究布局的不平衡。长期以来,我们闽方言研究者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到闽南、闽东这两支闽方言上,闽南方言尤其是“众矢之的”,成为闽方言研究的聚焦点,包括福建闽南话、台湾闽南话和广东潮汕闽南话在内的三大支闽南方言,几十年来先后发表的著述估计超过 400 篇(册)以上,而闽方言其他支系的调查研究、成果就大大不及闽南方言了。一些地方的闽方言,如海南闽方言、粤西雷州半岛闽方言,以及分散在浙、赣、桂各省的闽方言,至今研究者仍然寥寥无几。

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平衡。长期以来,我们较多地在描写分析方言音系、整理归纳方言词语,以及揭示文白异读、连读音变、本字词源等方面做文章,而对于闽方言的宏观研究,如综合比较方面和理论方面的一些问题却注意得比较少,著述也就很难见到了。1985 年张琨先生发表的论文《论比较闽方言》和 1986 年张光宇先生的博士论文 *Comparative Min Phonology*^① 以及 1991 年出

① Chang Kuang Yu (1986), *Comparative Min Phonology*, UC Berkeley.Ph.D.dissertation; 张琨,《论比较闽方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5 本第 3 分,1985,台北)。

版的陈章太、李如龙两位闽语学者的专著《闽语研究》^①等，可算是综合比较研究闽方言中较为重要的论著。近年来在《方言》等刊物上虽然偶尔也有一点从整体上、宏观上论及闽方言的文章发表，但是从数量和分量上看，都和闽方言研究的客观需要不大相称。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把描述整个闽方言面貌，绘制整个闽方言地图，编纂整个闽方言词典的工作摆到显著的位置上来；而福建省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编写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在印出《讨论稿》以后，陆陆续续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修改、定稿工作，迄今也还没能正式面世；至于广东、海南等省的闽方言全面调查工作，更是迟迟未能起步。可见闽方言的研究工作，还有许多填空补缺的任务需要我们去完成；研究布局和研究内容不够平衡的现状，看来一时还难以得到迅速的改变。

二、闽方言的分区问题

闽方言分布地域广，内部差异也很大。关于闽方言的分区，从大区到小区，从省内到省外，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经过几十年来的讨论和实践，现在有的问题解决了，有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取得共识。

长期以来，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在给汉语方言分区时，一直是把闽方言作为汉语方言中两个并列的大方言区对待的。他先是在1934年为上海《申报》60周年纪念印行的《中华民国分省新图》中所提供的语言区域图里把汉语方言分为九区，其中就有闽方言和潮汕方言两区；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他对自己所提的九区方言作了修订，修订后仍是九大方言，而闽方言仍为两区，只不过把原先的“闽方言”具体化为“福州方言”，而把潮汕方言改为厦门—汕头方言。这反映出赵先生始终认为福建东部福州一带的闽方言，跟闽南地区包括粤东潮汕地区的方言，是应该在汉语方言的分区中分立两区的^②。与此同时，另一位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则把汉语方言分为八区，而认定“闽语”只能算作汉语八大方言中的一个区^③。20世

① 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年。

② 赵元任的方言分区转引自丁邦新《汉语方言分区的条件》一文注二，丁文刊于《清华学报》第14卷1、2期合刊，1992，台湾新竹。

③ 李方桂的分区原载Chinese Year Book, 59—63，上海商务印书馆，1973年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Berkeley, U.S.A.)，创刊号刊出李氏《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一文，再次发表他的八大方言说，此文汉译本刊于《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北京。

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的语言学者一直采用丁声树、李荣两位先生提出的分列两区^①。而台湾的语言学者，以董同龢（和）先生为代表，则基本上沿用赵先生的九区说而略作调整，在闽方言的处理上改从李方桂先生的闽语合为一区说^②。海峡两岸语言学者对于汉语方言中闽方言这一支的态度，三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合为一区和分为两区两种不同的分区见解。把闽语分为两区的学者多着眼于差异性，目的在于突出两支不同闽语的差别；把闽语合为一区的学者则多着眼于一致性，目的在于显示闽方言的共性。尽管各地存在着许多差异，但仍然有“大同”的一面，有许多的“共性”。这两种不同的分合之见，应该说都是有一定根据的。

随着闽方言调查工作的逐步深入，各地闽语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加，在比较全面了解闽方言内部分歧情况的基础上，许多闽语学者，特别是福建省内的闽语学者，大都感到就闽方言的内部差异而言，分为闽北（或闽东）和闽南两个方言区是难以反映闽方言内部分歧的实际情况的，闽方言至少有好几个不同的支系，各支系都有明显的差别，但同时又存在着共同闽语的特征。与其分列闽北（东）、闽南两区，倒不如取其“大同”的共性而把各地闽方言统统列为一个大方言区——闽方言区，至于这个闽方言大区中内部各种差异，则留到分区的第二个层次——次方言（或称方言片）中去反映。这种观点基本上认同于早年李方桂先生把闽方言统列一区的观点，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有人提出^③，只是当时还未能引起方言学者的足够重视。进入 80 年代以后，闽语合为一个方言区之说才逐渐在中国大陆的语言学界成为主流。1979—1980 年，我写《现代汉语方言》一书和袁家骅教授修订《汉语方言概要》一书时，都用了“闽方言不再分闽南、闽北两大区”的观点，而使汉语方言的分区从原来的“八区”转为“七区”。我把这一“七区”的体系也引进到由黄伯荣、廖序东两位先生主编的大学文科教材《现代汉语》中来，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中汉语方言一节由我执笔。该教材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年来改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随后由张志公先生主编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现代汉语》教材也用了将闽方言合为一区的“七区说”，而原先采用“八大方言”的胡裕

① 参看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 年。

② 参看丁邦新：《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食货出版社（台北），1974 年，第 354—356 页。

③ 参看潘茂鼎：《福建汉语方言分区略说》，《中国语文》，1963 年第 6 期。